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八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五七期 ——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207d)

- | | | |
|--------|------------------------|--------|
| 【史海钩沉】 | 但悲不见九州同——解读《王维国遗稿》(上) | 于鹏飞·杜鹃 |
| 【史实订正】 | 向张玉凤、汪东兴当面求证“常委名单” | 杨银禄 |
| 【春秋史笔】 | 倡优蓄之而不自知——读《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 余杰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料解读】

但悲不见九州同——解读《王维国遗稿》(上)

• 于鹏飞·杜鹃 •

王维国，原 7 3 4 1 部队（空四军）第一政委，驻军上海。受“9·13 事件”的牵连被定为“林彪死党”，隔离审查，后被判刑。

我们很偶然获得了王维国《申诉书》的底稿，因其为王维国在狱中所书，尤显珍贵。王在服刑期间曾先后多次将其寄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书记处以及总政治部等处，不断为自己申诉叫屈，呐喊伸冤。出狱后他继续自己的申诉之路。今天的这份底稿上已经没有了具体日期的落款，孰知他寄了几次？寄了几年？当年监狱的头儿们对王不停申诉已是不胜其烦，他们对前来探监的王维国的子女们说：“你们劝劝他，叫他不要再写了！这个案子法院能定的了吗？是上面定的，而且你爸爸是搞政治工作的，他应该懂得的，写了没用的！”然而，王坚信自己绝没有犯罪，坚信党是实事求是的，坚信国家要走法制的道路，他不屈不挠，一直不停地写，不断地寄……。遗憾的是，他的申诉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他没能等到重新审查的那一天。

王维国 1 9 1 9 年出生在河北省元氏县万年村，家境较富裕，但他追求进步。1 9 3 2 年他参加组织了“反帝大同元氏分盟”；在保定读书期间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向往革命。1 9 3

3年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8年他在元氏县参加革命并且入了党。1939年他任元氏县抗日游击大队政委，对敌斗争表现的十分英勇。抗日战争中，他所在部队编入八路军第129师，他在秦基伟任司令员的八路军太行一分区担任团长、团政委。在党的领导下，多次参加对日军的战斗，并立功受奖。在解放战争中，也多次立功；国民党师长曾发告示，悬赏两千块大洋买他的人头。解放后他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王维国奉中央命令，被选调去参加我军第一个空降师的组建工作。1954年调任空军第19师副政委、政委。1962年调往上海任空四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65年调往杭州任空五军副政委。1966年调任空四军第一政委。文革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市委常委、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曾被选为中共中央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1982年初，王维国作为“9·13事件”中南京军区的“代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受审，时已被羁押10年半余。审理中据理抗辩长达9天，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不服判决，上诉后二审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维持原判。1985年刑满释放，被安置在河北省邯郸市郊某县城。1993年6月6日因病去世，终年76岁。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申诉书》是王维国生前唯一遗留在世的文字（下称《遗稿》），它洋洋万言，从头到尾一个“错”字，从上到下一个“冤”字，是对“9·13事件”专案的一次极具代表性的呈现；开卷闭卷，均使人感慨万千，更令人拍案而起！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说过：人生最终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遗稿为我们展示的恰恰是这样一种人生的价值观，读后倍感沉重。是什么令一个当年的“枪杆子”，在人生的最后十一年里成了坚忍不拔的“笔杆子”？我们应当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遗稿》已不仅仅是一份申诉，而是作者以法律之矛刺向人治之盾的抗争，是一篇为公正而向专制申辩、为清白而向命运不甘、为人权而向历史发问的遗言！

当年那场吸引了全世界目光、号称经得起历史和后代的检验的审判，仅有“调研小组”的陈伦和与王维国两个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了，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和认命。今天回看审判全程，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一司法活动具有极其鲜明的政党化色彩，正是一党专政的高度体现。

一直以来，在反映和研究“9·13事件”的史料里，反映中央层面和北京地区的较多，官方记载的较多，且大多都集中在原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几个主要成员上，揭示所谓“小舰队”方面的少之又少，反映刑满释放人员话语权的更是凤毛麟角，这对研究文革史，研究党史是一大缺憾。特别法庭成立的本意是清算文革和开创法制时代，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清算是不伦不类的，不仅不彻底，人治也始终没有退出政治舞台。当年中央文件的不实内容任其流传至今，几十年来给党史、给政治改革留下了诟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不良影响。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告诉我们，林彪本无集团，黄、吴、李、邱等人乃是林彪部下，与林彪的关系正如黄永胜在特别法庭上所述：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571工程”纪要》出自林立果等人，“9·13事件”不过是林家父子的逃亡之旅；而当时一大批优秀的空军军官出于对党和领袖们的一贯忠诚，在不明路线斗争真相的情况下，或听从了林立果的调度，或履行了本职行为。

《遗稿》主要为我们展示的是上海的文革场景，是继徐景贤《十年一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4年2月第二版第一次印刷）、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其子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9年4月第一版）等有关著作之后，人们得以从所谓“林彪集团”这一层面再次走近上海的文革、走进上海帮，走近林立果和王维国。因此《遗稿》的面世，对于作者、作者的后代，历史研究者和读者而言，都是一件幸事。由于格式和内容上的限制，《遗稿》不可能还原历史全貌，只是概括地将上海文革、文武之争、

林立果所为以及审判的真相一一呈现出来，为此我们采访了王维国的长子王大章，以期对遗稿予以补遗和解读。

王大章出生于1948年9月，于1967年4月入伍，从1969年4月起至“9·13事件”爆发，期间一直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又称“五七”理科试点班）就读，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1970年7月入党，在校期间曾任团支部书记；1971年9月21日被隔离审查；后被复员处理，并被开除党籍；退休前为上海市宝山区某企业工会主席。由于时间久远，又是站在了子女的视角，所以偏颇和差错是难免的。希望力求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将四十几年前历史的部分真相及细节得以客观重现；同时也尝试着针对长久以来一家之言再做辨析。

一．祸起萧墙，没有硝烟的新战场：军管会

文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场政治灾难，从结局来看，对王维国而言也是一场个人灾难，它起因于来自北京的两个电话。

1966年12月25日，由于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人造反派”（下称“工总司”）和其对立面“上海工人赤卫队”（下称“赤卫队”）之间的表态，导致“赤卫队”几万人包围了康平路市委大院。张春桥立即不失时机地通过徐景贤等人煽风点火，怂恿“工总司”头目耿金章、王洪文调集四五万名手持凶器的造反派围剿赤卫队，从而引发了上海的第一场大武斗，当场抓走“赤卫队”骨干300余人。随后“工总司”又制造了流血的“昆山事件”，数百名赤卫队员先后被铺，受到刑讯逼供，主要负责人被判刑或管制。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又直接策划了《文汇报》夺权，5日《解放日报》宣布夺权；12日，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和时任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兼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造成了上海市权利的真空，史称“一月风暴”。上海滩风起云涌，形势迅速恶化，49个区、县、局单位，在三天之内都被夺了权，2月5号，上海市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各路造反派头目纷纷争夺权利宝座，王洪文等人顺利上位。

就在造反派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中央已经看到上海及全国各地动荡的形势，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23日毛泽东提议，决定派解放军“三支两军”。上海发生的情况中央格外重视，据王大章回忆：他父亲担任上海市的公检法军管会的主任，是受命于军委办事组和中央，并且自实行军管到“9·13事件”，这个职务一直由他父亲担任。王维国就是在当时那样纷乱的形势下和复杂的背景里，与一群政治暴发户为伍，走马上任的。

按理说上海市公检法的军管任务应当顺理成章交给上海警备区，为什么交给了空四军王大章并不清楚。也许因为警备区长驻上海，与旧市委的渊源比较深，陈丕显本身就兼任警备区政委，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不仅和陈丕显是工作搭档，个人关系也很不错，尤其当陈受到造反派冲击时，他是坚定维护陈的，令张春桥等人大为不满并多有摩擦。担任公检法军管会主任职务的人，与新上任的造反派之间的关系如何，很可能是中央考虑人选的一个因素，而王维国则素来与市府、市委没有瓜葛。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出版，2011年1月香港出版）（下）中，对“三支两军”（即支持左派群众、支援农业生产、支援工业生产、实行军事管制、训练院校师生）是这样记载的——“‘三支两军’工作一直在主席手上，具体工作一直在总理手上，林彪没有具体管过‘三支两军’工作。军队支援地方的干部，不论是曾经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还是派往国务院各部委，都是办事组从全军挑选的，这些人的工作都得到过主席、总理的好评。……我在办事组负责选派支左干部的选派工作，工作相当难做。部队干部一般文化比较低，而且从曾经革命

开始就在部队工作，多数人方法简单，很难适应地方的工作，但总理一个劲的要人，只有在部队里选来选去。”（P 5 4 1）这段文字对应了王大章的回忆。

上海市是直辖市，相当于国务院部委或地方省委一级，王维国后来被“三结合”，进入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的被选中可以说是由于工作“得到过主席、总理的好评”。名单是军委办事组给出的，由总理亲自落实的，既与上海帮无关，也与林彪无关。

按照上海帮夺权后的如意算盘，以为已经摘得了文革胜利的桃子，想怎么“吃”都行了，很可能一开始张春桥他们就没把“军管会”当回事，市委、市府都已是囊中之物，上海市的生杀大权已经在握，公检法还在话下？那不过是个市府下面配套的机构，相当于饭后一块的“甜点”；谁知遇上了顶真的王维国，让他们尝到了北方又粗又硬的“窝头”。

首先把中央这一决定通知王维国的，是军委办事组副组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吴在电话里说：中央决定上海公检法三个单位，全部由空军担任军管。对这个决定，王维国的态度却是出乎吴司令的意料，他推说，执行“三支两军”我们已经派出了很多干部了，再军管公检法的话，我们已经派不出干部了。这样我们部队正常工作也要受影响。他跟吴法宪这么讲，就等于把这件事给推掉了。

正像当初军委办事组对军管人选名单所担忧的那样，王维国一直在部队，并不熟悉地方工作。他身处上海多年，尤其是文革以来发生的诸多事件他都耳闻目睹，现在让他接手地方工作，去趟上海这滩浑水，困难是明摆着的，对于公检法军管会主任的大权，于公于私都无意染指。他对权力的态度，与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陈阿大之流相比自是截然不同；与从1965年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的张春桥而言，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王力曾经记下了毛泽东在1966年12月26日生日那天，毛对王力等人说的私房话，要旨是：“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世界”，要以新代旧。张春桥曾经很露骨地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浩劫上海滩——一个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耳闻目睹》P 18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一版，下称《浩劫》），张有思想、有文化、有地位、有机会，深得毛泽东发动文革起因的精髓，在文革中个人野心极具膨胀。他在文革中与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协助和林彪对毛泽东的追随不同，周、林二人对毛泽东晚年思想体系只是被动贯彻而没有真正继承，只有张春桥才是秉承这一理论的最好的接班人，最好的实践者。文革中他利用群众打击排斥异己，就是为了往上爬，为了“总把新桃换旧符”，为了自己有一天能在中国叱咤风云。所以上海帮赞成文革，对权力趋之若鹜，在乱中取胜，靠造反在政治上发家，他们是文革最大的受益者。毛远新曾经回忆说：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毛泽东最终决定“让王洪文、张春桥让一让”，由华国锋继任总理一职。毛远新就此向毛泽东反馈说“王洪文对这一决定表示同意，张春桥则没什么表示。”其实“没什么表示”就是一种表示：表明了张春桥的野心与失落。

王大章回忆道：“吴法宪做不通我父亲的工作，后来没想到周总理亲自打电话来做他的工作了。”听父亲说，周在电话里跟王维国讲：“中央任命你为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希望你把这项工作抓起来。”既然是周总理代表中央亲自打来电话，王维国当然就不可能再推了，没二话，坚决执行，就像打虎上山的杨子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于是王维国走出军营，登上了上海的政治舞台，担任了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同时还兼管着上海市警卫处，专门负责到上海来的中央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安全保卫工作。

公检法军管会是市革委会的下属，各级政府都有，从市里到各个区都同时军管，意味着空四军的干部担任了各级公检法系统的一把手。王大章记得，当时参与各级军管会的有炮8师的师长刘志明，炮3师的政委刘忠朴（音），独5师政委周正美等。市军管会的副主任由师职干部

担任，具体工作由这些人做，王维国总负责，但刚开始接受这摊工作的一些具体事情，王维国都是直接参与的。军管对王维国和空四军而言，不仅仅意味着出人，还是出事，接下来麻烦事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了，与王洪文等人之间的摩擦也就因此而起。

王维国在担任了军管会主任以后不久，很快发现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的问题。

首先在甄别案件时发现，各个分局和包括市局里面，都关押了很多“赤卫队”的人，理由是“反对王洪文”、“反对‘工总司’”。担任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应该说这是王维国第一次接触司法工作，可以说《遗稿》中大量的法言法语及法律条款的引用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当时刚颁布的《公安六条》规定，依法惩办“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盗窃国家机密、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正常进行”；保护革命组织，保护左派……依法惩办“那些打死人民群众的首犯，情节严重的打手、以及幕后的操纵者”；其中第二条特别规定：“凡是……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在实际执行中，这一条又被扩展到适用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即中央文革小组的人。

《公安六条》与1951年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一样同属单行刑法，后者主要是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在此运动中发生的贪污、受贿、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问题都在这部法律中加以规定和解决；《公安六条》是为了解决文革阶段出现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凡有反毛、反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中央文革的行为……才符合《公安六条》惩治的规定，才能被抓起来；王洪文虽然位尊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但这个受国法保护的名单里并没有他的名字。

王维国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认为应该按中央规定办，哪些人该抓才能抓。他说，“工总司”和“赤卫队”都是群众组织，如果没杀人放火，没搞打砸抢，就不能抓。“反王洪文”和“工总司”算怎么回事啊？你王洪文算什么啊？所以他就以《公安六条》为线，凡符合规定的就留下，凡是不符合的就命令放了，这样一来就把“赤卫队”的很多人给放了。

“赤卫队”被放的人里有大小头目，回去以后很得意，跑到对立面“工总司”去炫耀：看看，你们把我抓起来有什么用？老子不是被放出来了吗？“工总司”的人一看，咦？你们怎么出来了？仗着势众又把这些抓起来，再送到公安局去。

分局向王维国报告：那些人又被送进来了，怎么办？王维国开始还是比较注意军民关系，比较讲究策略的，他说：这样子，你也不要跟他们发生矛盾，到时候和这些老百姓（“工总司”）的关系搞僵了也不好，送来了你就收下，等他们走了，你再把人放掉。就这样反复几次。王维国这样做也是为了回避矛盾，是从团结的意愿出发，达到搞好工作的目的。

这样一来，王洪文不干了：这不是跟我搞名堂嘛！？仗着有张春桥撑腰，对王表示了不满，但王维国照旧。王并非缺乏政治上的“远见”，没有意识到王洪文是张春桥赏识的人，背后有张春桥撑腰，张春桥的背后是江青，而且他们的政治地位正在快速上升。王维国是个性格耿直，原则性很强的人，他坚持认为：“我就按照中央的《公安六条》办事，你如果想让我按照你们的意愿，违反法律来制裁这些人，那是不行的！”

王维国和王洪文为此发生了正面冲突，具体不详。事后，有一次王大章听他父亲语气有些激动地在电话里讲：“今后各分局注意！凡是‘工总司’送来的‘赤卫队’的人，一律不收。他们一定要让你们收的话，叫他们直接送到市公安局，送到我这里来，叫他们找我！”

王维国光火了，公开和王洪文对着干了！其实王维国遇到的问题根子在中央，是毛泽东的“大乱达到大治”，与恢复一定秩序、维持社会稳定这两个相矛盾的国策并举在下面落实的具体体现。联想到他在法庭上抗辩9天，判决生效后一直不放弃申诉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在原则问题上宁折不弯的，甚至有点俗话说说的“死心眼儿”，挺像李作鹏对林彪的描述：觉得没有错，就绝对不认错！

王维国的原则性再加上燕赵之人的性格，在上海帮一统天下的圈子里怎么能不吃亏呢？也难怪他后来越来越感到处境艰难，为了对中央负责，为了坚持原则，为了维护上海市的秩序，为了抵制来自市委领导的压力，为了把工作搞好，王维国很自然地想寻找一个能够支撑自己的政治力量了，当然那是后话。

后来王维国发现，王洪文他们开始私设公堂了——他们抓住“赤卫队”的人不再往公安分局送了，自己搞了。实际上私设公堂原来就有，陈小津在书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工总司”就曾经把“赤卫队”的人打的一塌糊涂的了再送到公安分局去。私设公堂的事王维国管不了，但经过这样较量之后他明白了：王洪文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私设公堂的事情都敢做，这绝对是违反国家法律的事情嘛！

王大章回忆，那时他父亲和王洪文之间蛮泾渭分明的，你不搞到我这里来，我也不管你，因为晓得王洪文的后台也蛮硬的，是中央文革，是张春桥嘛，当然我也不去搞你，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你要是到我的权利范围之内了，我就按照《公安六条》来办！你要叫我违反法律、违反规定来制裁人是不行的。

上述即是《遗稿》所强调的“我们和‘上海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绝无勾结，只有斗争”的一个真实写照。王维国在《遗稿》的附件5——“我们在上海与‘上海帮’的斗争概况”的项下，一口气罗列了13条，足以说明张春桥、王洪文及其上海帮，就是搞乱上海的罪魁祸首，王大章回忆的不过仅仅是其中第3条而已。张春桥无疑与王洪文是一伙，随着王维国与王洪文之间越搞越僵，张春桥自然也对王维国的态度也变了。

2011年第九期《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由孙路遥整理的原上海市革委会政宣组组长的朱锡琪的口述回忆“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一文，朱是1968年这个事件的发起人。文中提及1967年初夏的一天，张春桥叫朱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了解一下“反军管”是怎么回事，朱就去了。原来“反军管”是张在一次会议上点的头，所以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朱对此事的回忆仅寥寥数语，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但由此可见张春桥对“军管”的态度和其老辣的政治手腕。

在上海帮逐渐壮大成为四人帮的过程中，他们遭遇“枪杆子”抵抗的“战场”在全国实际上有两个，一个在中央，与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等人；一个就是在上海——王维国以绝对弱势孤军奋战，带领着空四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抵制以张春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的种种不法行为。

上海在文革期间的混乱和全国各地一样，来自中央，来自毛泽东的号召，上海帮就在混乱中逐渐形成、壮大。“9·13事件”之后，没有了王维国与之抗衡的上海帮更猖狂了，据记载：1973年后，四人帮及其余党推行所谓民兵、治保、消防三位一体，用上海民兵取代上海的公安机关，在全市三千多个基层单位取消了原有的保卫组织和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治保委员会。一九七四年九月，上海民兵指挥部制定《关于上海郊县民兵在抓阶级斗争中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规定县民兵指挥部有管教、逮捕、关押、审讯、定案的权力，这就无形中用民兵指挥部取代了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能。1975年9月，四人帮余党戴立清、宋桂生在皖南上海后

方基地，又搞了一个民兵、公安、法院三块牌子组成的班子——“兵公法领导小组”，上海乃至全国各地纷纷仿效上海的“样板”，搞起了民兵组织，并以此取代了国家的司法机关。从这一系列“怪胎”产生可以看出，四人帮对军队和国家司法秩序一向是排斥的，总想另搞一套，换上他们的“新桃”，可想而知当年王维国就是他们乱党乱国的“绊脚石”和“拦路虎”了。

关于遗稿附件5的第11条提到的“游雪涛特务小组”、“扫‘地雷’的斗争”，王大章记得曾经两次听他父亲很愤怒地指出：“游雪涛是个特务！是张春桥的一个特务啊！”其中一次是跟刘志明来跟王维国汇报工作时，他在一旁倒茶水听见的，这已经是王大章第二次听父亲说了。当时正值昆明军区的谭甫仁被暗杀，各方面都很紧张，北京空司大院团以上干部还发了枪。说明王维国他们当时已经觉察了游雪涛的所为，并着手调查，这也是令王维国与上海帮由不和转而对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的“游雪涛小组解密”一章，详细讲述了它的来龙去脉，游正是徐推荐给张春桥的。游雪涛小组从1967年1月起就受到了张春桥的纵容和保护，为了掩人耳目，在张春桥的旨意下，三个月后游雪涛获得了“上海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的合法身份，正式成为了张的走狗和帮凶。他们疯狂的特务活动，不仅威胁到了公检法，也威胁到了上海警备区，廖政国掌握情况后很生气，说：“我们上海警备区有一只伸进来的黑手！”（2008年12月2日《扬子晚报》B7版“张春桥豢养‘文革别动队’”，作者刘向上）

徐讲到“游雪涛搞情报、绑架、插手的都是专政部门，又是军队、又是公检法，特别是插手公检法后，得罪了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王维国……与王洪文和我们面和心不合，……他反过来收集到了游雪涛小组活动的材料，这使张春桥感到情况严重，那时正是张春桥、江青这一伙和林彪集团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是王维国把游雪涛的问题攻到张春桥头上，他会感到非常被动。”

游雪涛小组的矛头唯张春桥意志为转移。二月逆流之后，游雪涛闻风而动，一份叶剑英女婿钢琴家刘诗昆的父亲刘啸东的情报送到了张春桥手中，张指示“拘留刘啸东”。几天后，刘啸东被拘留，由游雪涛亲自审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事发生在1968年3月底、4月初，王维国已经担任军管会主任年余。据说当时王维国“还对游雪涛来了个反特工、反侦察，搜集了不少游搞特工活动的情况，准备报送中央军委”（见“张春桥豢养‘文革别动队’”），“9·13事件”后王维国命令将其深埋而非销毁，也是耐人寻味的。

徐景贤证实了王维国当年的判断，也证实了王维国申诉里所说——“我们和‘上海帮’即江青反革命集团绝无勾结，只有斗争”是属实的。事实上，游雪涛小组一事反映了张春桥政治上为人阴险，游之所以胆大妄为，反映出张春桥及其余党在上海已是无法无天，视党纪国法为儿戏。此举令王维国与张春桥、王洪文的关系雪上加霜，私下里非常对立，只是双方没有撕破脸而已。

谭甫仁事件、游雪涛的特务活动以及台湾国民党特务的活动令当时上海的形势十分严峻，王大章记得一天刘志明叫住他说：“今后你爸爸不能一个人、一辆车出去，特别是晚上，必须开两辆车，没有车我们公安局可以提供。出去一定要带上警卫员，不能让他一个人出去。要加强警卫和保卫！”这番话今天听来，仍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紧张气氛。亏得王维国还是堂堂的上海市公检法主任！

《遗稿》的附件5虽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罗列，而且有的内容短如小标题，即使这样我们也不难发现，13条里居然有9条是涉及到三支两军和军管会的。这足以让人感受当时上海形势之混乱、上海帮之狂妄、王维国之举步维艰，可谓处处下风，明枪暗箭，防不胜防。这样的

关系，怎么可能是“勾结”呢？

我们知道的基本事实，林彪、江青集团文武不和，在党内路线上是有分歧的，双方明明是在斗、在争，特别法庭则根据中央的旨意，故意视将林、江二者“穿越”在一起，称其为“勾结”，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林彪集团”当年他们反的就是四人帮！不是为此得罪了毛泽东，林彪怎么会从政治巅峰一落千丈？对于“勾结”一事，徐景贤的《十年一梦》也予以澄清，实际上就是否认。江青则干脆在收到起诉书时对检察官说：“你们说林彪、江青集团，不对。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法庭界定“集团”和认定“勾结”的这些依据，如今在历史面前还站得住脚么？

王年一指出：毛泽东在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红旗》1967年第1期）的文末加了一大段黑体字，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开头，其有“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一语。这是对文革的评价，已经高到无法再高。显然，毛泽东自认是其斗争哲学的一次伟大实践，是得意之笔。林彪、林立果等人则从国民经济、民生和国家秩序方面与毛泽东渐行渐远。

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到了刘邓陶，中央文革就像“毛办”。邱会作回忆说，他们进了政治局，开始参加政治局的日常工作，总理从爱护、关心、教育我们出发，和我们讲了几次什么“中央政治”以及属于“中央政治”范围里的问题。什么是“中央政治”？总理说：“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毛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邱会作回忆录》P680）。这样看似简单的答案显然大大出乎邱的意料，邱多年以后才领悟。

其实毛泽东早已将他自己、党、革命三位一体了，中国的每个人都受到了党的制约，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以王维国的地位和水平，是很难明白的。他对上海帮的反感，其实是对文革的反感，而最终归结到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

二．沧海横流，上海滩头谁主沉浮：矛与盾

《我的文革岁月》一书有几个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陈小津老讲他父亲倒台是因为“林彪、四人帮”。现在这种“套话”、“官话”仍在盛行，已经误导了两代人了，如果不予以纠正继续误导下去，实在堪忧。当然他这样说自有他的苦衷，他对文革也显然没有好感。但他为什么老提“林彪、四人帮”？王大章分析，这和实行军管以后，空四军接手上海市的专案组工作有关。

军管以后，陈丕显专案组由军管会的空四军26师政委魏士英负责，魏是组长。陈丕显被“解放”出来到中央工作后，曾经专门派人去调查他的专案情况，然后派人到魏家表示感谢。陈和魏之间怎么会有交往呢？这是因为魏士英在经手陈丕显专案时，对案情实事求是，对陈也比较照顾，并且经过甄别，做出了陈丕显不是叛徒的结论，当然魏是不敢拍板的，这件事情与王维国有直接关系，是在他的亲自过问、指示下才得以落实的。

王大章回忆说，他见过父亲和魏士英专门讲这个问题。当时王维国用手做成一个眼镜圈子的样子，在自己眼睛上比划了一下，意思是指张春桥，对魏说：“（张春桥）要叫我们把陈丕显打成叛徒，其它东西他可以‘搞’，但陈丕显从来没有被捕过，你怎么能讲他是叛徒？这不是胡搞嘛！”这是王大章亲耳听到的，在场的还有其他人。王维国对下属说：“你讲陈丕显有其它问题，比如走资派啊什么的，那我们吃不准，也不知道。但你讲他是叛徒，起码他得被捕过……才能当叛徒吧？曹狄秋被捕过，陈却是连被捕都没被捕过，你怎么讲他是叛徒？这一点起码不

能成立，对不对？是不是叛徒，必须要有过硬的证据。但陈丕显连被捕都没有被捕过，你凭什么讲他是叛徒呢？最起码，叛徒这一点不能成立吧？！”从王的口气当中，能听得出张春桥的意见是什么，也能听得出他的压力和无奈。在这个问题上王维国显然很慎重，坚持实事求是，分析的道理丝丝入扣，即是讲给部下听的，也是讲给自己听的，与后来《遗稿》的思辨风格一致。王维国的做法无论按照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在“保”陈丕显，这样做对王维国只有风险没有好处，是要顶住市委、特别是来自张春桥的巨大压力的。

据知情人讲，魏士英是空四军第一批派去支左的干部，负责包括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副市长李干成、市委组织部杨士法等在在的好几个人的专案。当时魏对李的问题复查了六次，对杨的问题复查了七次，证明他们都是真党员。并且查明陈丕显历史上没有被捕过，更没有当过叛徒，魏把这些情况都向王维国做了汇报。王不顾张春桥等人的明确“指示”，对魏士英说：“你把这些情况打个报告，我来签字！”于是当时这几个被专案组审查的走资派都获得了自由。等到张春桥发现，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气得张春桥、王洪文大发雷霆，拍着桌子大骂：魏士英是个大右派！竟敢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王维国在魏办完此事后立即将他调回了军里，使魏避开了张春桥的追查和迫害。

王大章介绍说：我父亲为人正派，脾气比较耿直，他认为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我就跟你对着干！“9·13事件”之后，魏士英一家跟我们都在江湾五角场的空军政治学校住过一段时间，两家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魏的爱人王鲁平阿姨和大儿子，都跟我讲过陈丕显派人来看望他们这件事。这件事情过去很多年了，历史证明了我父亲那样做是正确的。

无论王维国的指示也好，魏士英的执行也罢，最终陈丕显没有被定为叛徒是实。张春桥欲置陈于死地而未能得逞，在这个问题碰了个大钉子，以张春桥惯于不择手段的阴险卑鄙人品，他能不记仇吗？后来王维国又在庐山上公开批判张春桥，张能不恨之入骨吗？！“9·13事件”后，四人帮更是不可一世，他们把持了专案，能不快意恩仇吗？

其实何止13条？王洪文还曾经用“杜忠事件”来大做文章。杜忠也是1968年8月1日被派到上海公检法军管的空四军某师副师长，担任了某专案组组长。在工作中，杜忠接触到涉及张的许多材料，掌握了张春桥本人十分严重的问题。“9·13事件”后，张春桥指使他的亲信对杜忠进行隔离审查，妄图掩盖自己的罪行，后面的情况王维国就知道了。实际上一直到1973年10月杜忠才被放出来。在待处理期间，杜认为张春桥的问题事关重大，一连向中央写了4封信揭发张的罪行。结果可想而知，在张春桥、王洪文严密控制下的上海，这些信全部落到张春桥等人的手中。“杜忠事件”虽然随着“四人帮”被打倒而结束，杜忠最后还是因“四人帮”迫害折磨致死。（2010年08月17日福建党史月刊，“文革后期王洪文为何在空军炮制‘杜忠事件’？”）

王大章也听说，当年杜在安徽巢湖农场，一天吃完晚饭出去散步，人就再也没有回来。几天后，他的遗体才被从河里打捞上来了，杜双手抱胸，口鼻和指甲内都没有泥沙，内脏也丝毫没有溺水而亡的特征。在四人帮的控制下，杜的死亡原因被定为“自杀”。

王大章说他父亲和张春桥、王洪文他们的矛盾已经到了白日化的程度了，“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甚至于市里开会时，汽车停在那里，驾驶员之间都互相挖苦来挖苦去——这边说：还是你们狠，你们什么什么东西！那边讲：哎呀，哪有你厉害呀，你是……怎么怎么样！连汽车司机之间都阴阳怪气的互相掐，到了这种程度，可见那时双方之间矛盾真是很大了，而且是很公开的了！

王大章回忆说，我父亲还负责毛泽东上海驻地的警卫工作。

1970年3、4月间他第一次接待来上海的毛泽东，当然是极其秘密的，我们都不知道，他突然失踪了5天。当时谁都找不到他，警卫员也扔到家里，谁都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连个招呼都没打，一下子就失踪了，而且长达5天！家人都紧张得不得了。那次就是找不到他，哪里都没有——市革会没有，公检法军管会没有，军里也找不到，巨鹿路招待所没有，能找的地方都找了。刚开始还没在意，后来实在找不到了，人到哪里去了？都有点着急了！但是他的车不在，晓得他肯定是办什么事情去了。他回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讲，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是毛主席到上海来了，他到那边负责警卫工作去了。

毛泽东在上海的5天里，他在那边查岗、查哨啊，很是辛苦！5天里只上床躺过两个钟头，一直在巡逻或者忙其它。包括伙房买回来的东西、烧出来的饭，色香味……他都要看的，都要过问。万一毛主席吃了拉肚子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平时要是实在太瞌睡了，就坐在沙发上打个盹。

之后毛泽东坐专列离开上海，到苏州去看望林彪，我父亲和马天水陪同前往。一路上毛向马了解上海的工业情况，也跟我父亲聊天，毛问“你是哪的人呐？”

我父亲说我是河北人。

毛又问河北什么地方啊？

我父亲说是元氏窦姬那个地方。

毛主席就讲了：窦姬那个地方可是个出宰相的地方哎！哪个朝代出了个谁当了宰相，哪个朝代出了个谁当了宰相……出过两个宰相。毛主席兴致不错，和他们俩谈的都很高兴。

林彪在苏州专线火车站迎接毛主席。毛就给林彪介绍：这个是上海的马天水，这个是上海空四军的政委，叫王维国。

林彪就讲了：清朝有个王国维，我们现在有个王维国，王国维是资产阶级的，王维国是无产阶级的。当时听了林彪的话，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这是林彪第一次认识我父亲，也是我父亲第一次见到林彪。

关于王维国第二次接待毛泽东的情景，王大章回忆说：

1971年9月5号，我在家里听见父亲和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很神秘的低声交谈：客人呢，在杭州了。我一下就猜到他们指的是毛主席。父亲说：客人已经在杭州了，陈励耘也没跟我们讲一声哦！后来两人讲，唉，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既然知道了，就先把招待所准备起来，卫生一定要搞搞好。

10号那天我因为学校的事情想请教一下父亲，就回家了。但父亲不在军里，到处打电话都找不到，联想到上一次毛主席来的情形，和5号那天父亲和李松亭的对话，我猜测毛主席又来上海了。我既兴奋又神秘地跟我妹妹讲“搞不好就是主席来了！”

毛主席当时是全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是非常崇拜和敬仰毛主席，我很兴奋地嘀咕，现在老头子（指我父亲）和主席在一起呢，张春桥、王洪文，你们他妈的还想搞老头子哩，现在老头子是和主席在一起！当时觉得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很光荣！而且主席这么信任他，张春桥、王洪文你们还敢搞他？！我当时感到非常欢欣鼓舞。

就在10号那天，父亲接到李松亭的通知，说“有通知，专列已经快到嘉兴了”。嘉兴向东就出了浙江省，过来就是嘉善，说明毛的专列马上就要到上海了。

父亲马上电告上海市铁路局，要求调一辆火车机车的车头来，把专线和专线停车场都压一遍，看看路基怎么样，这是绝对不能出问题的。

另外，他说要通知王洪文一起到专线车站去。结果打电话找不到王洪文，父亲就带了警卫员一块儿赶往虹桥专线停车场了。

等父亲到了那个地方，一看王洪文已经到了，这说明有人通知我父亲的同时也通知王洪文了。当时他就想“噢，他先到了嘛。”因为按照道理应该是由警卫处，即我父亲通知王洪文的。“难道有人已经通知他了”的疑问在我父亲脑子里闪了一下。

通过王大章的上述回忆，王维国和上海市委的关系可见一斑。毛泽东来了，是件绝对机密的大事，而通知谁、谁先到，按照接待毛泽东的保密原则和流程，毛来应该只通知负责警卫工作的王维国，再由王去通知和安排毛想见的其他人。但这次不同的是，王洪文也接到了通知。这是个敏感的原则的问题，即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地位，也能反映出毛的亲疏。通知王洪文的很有可能是汪东兴，因为陈励耘和王维国一样，负责浙江的警卫工作，作为两处警卫工作的负责人，为工作交接一下是应有的流程，陈励耘不应该、也不会直接通知王洪文的。

第二天即11号上午，王维国安排接许世友的一架安2飞机从南京抵达上海，降落在虹桥机场。王维国接到许以后把他送到毛泽东专列的车厢门口，当时是上午10点钟。汪东兴迎出来，对刚要跟着许上专列的王维国讲：主席想同王洪文和许世友单独谈一谈，解决一下他们的关系问题，你可以不参加。

王维国一听就明白了，不管是汪还是毛，不是很想让他参加这次谈话，于是就退到休息室，所以11号那天他没上火车。专列候车室里，徐景贤、王秀珍、马天水等人都在休息待命。

大约到了12点左右，王洪文和许世友下了车，王到休息室宣布：现在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在锦江饭店请许司令员赴宴，喝酒！大家全都去！

于是所有的人都到了锦饭店江，特意还把警备区的司令员周纯麟，东海舰队的副司令高志荣都找去了，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吹牛。大家都敬酒给许世友，许世友也一一回敬，周、高、王三个人是上海陆海空三军的代表，许回敬了周纯麟一杯，也回敬了高志荣一杯，但究竟是疏忽了，还是心存芥蒂，反正许没有给王维国敬酒。看来毛的劝和很有效，在席间，许世友和王洪文还数次离席密谈。许世友回南京时仍然是王维国去送他，上飞机之前，许世友对王讲了一句话：“一切听主席的，不要上当！”

就在他们吃饭时，毛的专列开走了。当天晚上铁路部门向王维国报告：专列顺利通过徐州。这表明此次王维国负责的警卫任务顺利完成。

王维国一共接待毛泽东两次，这足以使他引以为荣。但是这两次的氛围、待遇、地位有着明显差异。前一次也不过就在一年多前，九届二中全会还没召开，毛林关系和睦，王维国一直陪着毛从上海到苏州，毛还把王介绍给林彪，那次根本没有上海帮的份儿，毛泽东的态度是亲近和依靠军队的。

这次则不同，上海帮地位明显上升，张春桥已经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了。

1971年9月毛南巡到上海，和他人谈话前后共约4个钟头，王洪文都在场，看来毛对

王洪文的好感已然有之。2012年第一期《炎黄春秋》刊登的“吴忠谈‘九一三事件’”一文，讲到“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丰台，找我们4个人谈话：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我。……主席讲了林彪的错误，说一句顶一万句，顶个屁！……主席讲了很多，但主要是讲林彪的错误，我当时的估计是三中全会要解决林彪的问题。”毛泽东写过《反对自由主义》，可惜他晚年时搞党内极权，任人唯亲，一言九鼎，随心所欲，毛才是最大的自由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回到北京的毛已经公开把林彪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拿了下来，这一点现在显然不是大胆假设了。

谁来取而代之？这是毛必然会考虑的问题。毛来上海，明显疏远军队，谁能否认后来毛选王洪文接班，一手组成四人帮，不是他这次南巡的收获之一呢？而且这次无论来还是走，都有人给王洪文通风报信，这个人很可能是汪东兴；如果是，就等于是毛。这更能说明毛对王洪文的重视，也是做给王维国看的，可惜王维国并无心机，对毛玩弄的这套权术毫无觉察。就在“9·13事件”以后不久，王洪文去杭州处理“9·13”专案，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王知常“奉命作为王洪文的随员，……去杭州的当天，王洪文拿了一封电报给王知常看，乃是王洪文做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的任命。王洪文和他的秘书廖祖康都是一身军装，春风得意。”（《浩劫》P148）以毛泽东的慧眼何以会看中王洪文这样只会吃喝玩乐的庸才？说明毛已昏庸之至，心里只有一个标尺——自己。拥护文革的鸡犬升天，不赞成的统统被贬或分道扬镳。王维国虽然反感上海帮，但对文革运动本身并没有思考，遗稿中也未见反思。这是广大军队干部的一个共同特点：只凭着对毛的一片赤胆忠心，紧跟毛，为毛保驾护航。

这一次王维国上专列见毛时，见毛讲到了二中全会上的问题，就想借机检讨几句，因为二中全会上他的发言矛头指向张春桥，后来会议气氛急转直下，所以发言也算是件严重的事情了。他并没有深入思考自己错在哪里，但庐山上毛的龙颜大怒令他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所以当着汪东兴和王洪文的面，就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批张春桥讲话一事，很真诚的向毛检讨，不料王刚说了一句“二中全会上，我也有错误，我也发了言了……”毛马上打断王，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了，并且很和蔼地讲：“你的问题就不提喽，这个主要责任在我，怪我事先没有跟你们打招呼嘛！”毛没有批评王维国，反而一副大包大揽的样子，显示出了领袖宽广的襟怀，王维国非常感动，备受鼓舞，如释重负。然而接下来毛却一个劲儿地批评军委办事组。在王维国听来，感觉就是批评包括自己在内的军队干部。毛泽东抓住庐山会议的事情不放，明批“枪杆子”，暗褒“笔杆子”，既对林彪敲山震虎，同时也给张春桥出了气。如果说毛给军委办事组掺沙子是为了平衡军内的帮派体系，毛给南京军区掺沙子，则反映出毛力挺文革派的决心，客观上助上海帮为虐，既可以用“异类”打破军队的一统天下，又堂而皇之地打着团结的旗号，把文革派和非文革派搞在一起，让他们相互遏制，彼此内杠、内耗，对自己表忠心、争亲疏，遂将他们分而治之。这些手法，不知道后来王维国、张春桥等人是否体会到了？

王大章还介绍说，当年王维国负责的警卫处，平时也负责市委领导安全的。比如张春桥要出来开会，警卫处处长就坐在第一辆前卫车里负责安全警卫，张春桥自己乘坐的是一辆老式的凯迪拉克的防弹车，很保险。刚开始他的警卫人员都是空军派的，包括汽车司机都是警卫处的人，后来彼此的矛盾大了，慢慢都换成了他自己的人。

逐渐的，张春桥也主动开始向王维国个人叫板了，他知道王维国不能公开拒绝，就提出把在农场工作化名肖静的女儿，放到空四军的通讯营去当兵，时间大概是在1970年上半年。那天王维国的司机老吴把已经穿好军装的肖静接到王维国家里，她一到，王维国就打电话让通讯营的营长和教导员到自己家里来，给他们相互介绍说“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肖静，你们好好照顾她”，“她很爱干净”。王又对肖静说，“你参加劳动可不能怕苦怕累，要和战士打成一片哦！”随后肖静就被通讯营的营长和教导员领走了。

1973年王大章结束隔离审查后听说，“9·13事件”后有人揭发说，肖静是受王维国迫害的，王维国曾经在安排肖静工作时私底下对通讯营的领导说，肖静是张春桥派来摸我们情况的。因为肖是通讯营电话的守机员，涉及到整个部队对外对内的联络，是很重要的岗位。听说王维国曾经嘱咐部下，肖静值班时，要派可靠的人陪同，不能让她自己单独守机。而且还有人揭发说，王维国规定：你们下面一不能给她提干，二不能让她入党，你们不要报上来，免得我们上面为难。

“9·13事件”后，肖静以受迫害人的姿态，先调到空四军情报处，后来又调到领航处等要害部门。四人帮倒台后，她又回到了农场。市专案组的人跑去找王大章，告诉他“上面说的”，王维国和张春桥早有勾结，让他揭发，并为此请他在宝山县某房间“留步”几天，专门写揭发材料。王大章一开始用事实反驳他们说：我父亲不可能跟张春桥他们勾结的！但这帮人把王大章当汤团一样，任圆任扁，就是要他这样去写材料。他们要求王大章把肖静的事情，写成是“早有勾结”的性质，还振振有词地讲：如果张春桥不信任你父亲，会把女儿送到你们那儿去当兵吗？这种逻辑和搞专案的态度，其实已经屡见不鲜，从A B团，到历次整风以及各种政治运动……可以说这种政治风气是共产党历史上由来已久、反复使用、屡建功勋的；无论搞谁的专案，都照搬照用。

王维国出狱后知道了这件事，很气愤。他告诉儿子：在最初被隔离审查时，办案人员让他交代他是怎么整张春桥一伙的黑材料的；后来四人帮倒台了，又让他交代他是怎么与上海帮“勾结”的。专案组还是那些人马，说法却与时俱进，前后性质颠倒，错的、有罪的永远是王维国，他们永远正确。他当然不能同意，针锋相对地指责那些人：“当初你们说我整张春桥的黑材料，现在又说我和他‘早有勾结’，人就两个鼻孔，都叫你们堵死了，总要给我留一个喘气吧！”这些现在听来极为荒唐可笑的往事，却不由让笔者想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如果王维国就是被这样搞出来的专案材料定的罪，举一反三地去思考，这不是一个王维国的问题了，在同样的专案风气和极左思潮影响下，该搞出多少冤假错案？……这，就是后来判决的依据吗？这不是在拿历史开玩笑、拿人的命运开玩笑吗？这样的结果能是严肃、公正的吗！？

同样荒唐的事情在那个远去的年代层出不穷，也发生在王大章本人身上。1973年9月，王大章结束了隔离审查到工厂上班了，能够重新呼吸自由的空气，能够和弟弟妹妹们朝夕相处，使得深感劫后余生的他非常知足，工作很起劲。虽然脱去了军装，但他还像在部队一样，佩戴着当时军队统一配发的毛主席像章。有人见不得他的笑容，汇报给了厂总支书记。书记找他谈话，满怀敌意地问：“你这个像章是不是林彪发给你的呀？你是不是在为林彪招魂啊！”天气冷了，王大章穿了一件父亲的呢子军装，厂总支书记又找他谈话，问他：“你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父亲的？你这样是为他树碑立传嘛！这样的衣服宁可烧掉也不能穿！”王大章忍无可忍，当即反唇相讥：“哦，我穿了件衣服就是树碑立传，那如果我改姓毛，我是不是就是毛主席的儿子了？我改姓周，是不是就是周总理的儿子呢？你们能承认吗？我不是还姓王吗？！”

这是真实的故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那个帽子满天飞、动辄无限上纲、极左思潮当道的年代，这些都成了再“正常”不过的家常便饭。

关于王维国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张春桥一事，《遗稿》中并没有展开去讲，但在附件5“我们在上海与‘上海帮’的斗争概况”项下第12条里，一改当年对毛泽东检讨时的口吻，认定在庐山会议上是“我直接批判张春桥反对毛主席的斗争”。王维国改口，当然因为四人帮已经倒台，表面上是为自己“翻案”；但从通篇来看，是王维国抓住了当年与上海帮相对抗一事作为遗稿的基本点，是他对审判最想不通并且认为最应该给予平反的理由所在。而王维国这第12条究竟是真的相信庐山会议上张春桥反对毛主席，还是借官方的调子为自己申辩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无论是王维国“勾结”了张春桥，还是张春桥“勾结”了王维国，都不过是官方编造的说法，

已经遭到历史的唾弃。后来的他应当明白，庐山会议上军委办事组几员大将指责张利用毛的伟大谦虚反对毛主席，将憋了很久的不满发泄出来，是抓住了一个攻击张春桥的机会，因势利导，做给毛看，性质上仍然是唯毛是从，以左反左而已。而不再坚持追随毛的林彪，与几员大将仅仅反感中央文革不同，与张春桥更有本质上的区别。

三．鱼龙混杂，虽败犹荣的空四军：党代会

资料显示，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71年1月4～10日在南京西路上海展览馆（今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出席代表1000人。这是文革开始以来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距离上一次党代会将近8年。这次将组建新的上海市委，组建新领导班子了，是对权力的再分配，上海帮对大会自然十分重视。

开党代会之前江青找王维国谈过话，叫他不要“争”上海市委书记这个位子，尽管王维国并无此意。江青讲了几条理由，第一，你已经是中央候补委员了嘛，今后都是集体领导，你就不要去争书记这个位子了；第二，上海警备区是地方部队，空四军是野战军，地方部队主要是维持地方治安，而野战军有可能要调动；第三，原来上海市市委的领导里面，警备区出一个常委，空军和海军各出一个市委委员。这次大家都升一级，警备区出一个书记，空军和海军各出一个常委。江青的意思就是不让王维国当上海市的书记。这时廖振国已经离任，接任者是周纯麟，上海帮想让周当书记，并不是因为周和上海帮关系好，而是因为王维国跟他们关系不好，他们才想出这么一个理由。由于江青的参与，可以说这是四人帮从组织上排挤王维国的开始，是他们动手将王维国驱逐出上海权力圈子的第一步。

王大章回忆说，由于当时解放军的地位是很重要的，所以党代会上陆海空三军都有代表讲话：陆军是周纯麟，海军是高志荣，空军是王维国。我父亲早就明白上海帮和自己不是一路人，既然江青有言在先，看来他们要动手剃自己这个“刺儿头”了。他索性提出来：这个会我就不参加了，话也要不讲了，我身体不太好，要到医院去养病去。空军代表讲话就让军长郑长华去讲，我也讲不动。

张春桥得知王维国是要对着干，他就发话了：“王维国怎么叫身体不好、讲不动呢？他给空军排以上的干部作报告，有一次是讲了六个钟头嘛！”足见张春桥对空四军的情况了如指掌，“会要参加，话也要他讲。”张春桥这么一讲，我父亲就没办法了，好，讲就讲吧！

由于军人不像文人善言，所以当时三军代表讲话都写好了稿子，准备上台照着去念的。徐景贤又提议了：讲话就随口讲，不要按发言稿念了嘛。徐景贤当时是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他后来也是上海市的书记之一。王洪文还没上来的时候他排名在张春桥、姚文元之后，号称是“徐老三”。所以他这么一讲，别人就不得不考虑他的意见了。

文革前徐景贤是“丁学雷”写作班子的负责人，文革中又以“罗思鼎”为笔名。他是文人，但能言善道，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大会上讲话是徐的强项，他的提议实际上是让大家学他，就随口讲。不知道徐景贤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口才，还是要难为一下军队代表。总之后来周纯麟和高志荣都响应了徐的号召，在讲话时背稿子。他们都有些上了年纪，这样做也真是勉为其难，遗漏、重复、颠倒频出，发言的效果大打折扣。轮到王维国发言了，他才不管徐景贤的什么建议，上台拿着稿子照念不误，条理清晰，声音洪亮，效果非常好。讲稿上没有注明“（鼓掌）”、“（领呼口号）”的地方，与会代表听到情绪激昂处，都自发地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的口号。王维国讲完话，得到了代表们最热烈的掌声。据空四军收集上来的“情况反映”中写道——群众反映强烈；一致说空军讲话讲的最好。

王秀珍是负责大会后勤的，她提出来：你们三军都有文艺宣传队，能不能晚上给代表演出点节目啊？本来警备区能演京剧《智取威虎山》全场的，但他们只演了场片段，折子戏。演的质量也不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样板团的齐淑芳扮演小常宝的脸是圆乎乎的，警备区那个小常宝的脸是瘦长的，那怎么像呢？演着演着代表们就看不下去了，纷纷退场了。

第二天轮到海军演，都是当时流行的对口词、三句半、快板，小歌舞等小节目，效果也一般。

第三天是空军。有了前两天的经验，所以去看演出的人并不多。空军演的是京剧《沙家浜》的折子戏。空四军的演员是专业的，布景、道具，也非常好，演出的水平和样板团的不相上下，演完了反响很强烈。结果第四天有不少代表们向大会反映，因为前面两天演的都不好，我们就不看了，没想到空军演的这么好，要求重新“补课”，并且演全场。王秀珍当然不同意，她怕的就是空军扩大影响，长王维国的威风。

此事过去，后来王秀珍又给三军出题了：你们是不是给大会献点礼呀？于是三军纷纷行动起来，警备区的礼是杀了几十头猪；海军献的是鱼、海蜇头之类的海产品。空军拿不出特产怎么办？领导连夜开会商量，决定让印刷厂赶印一批《毛主席十篇哲学著作（大字本）》送给大会，红色塑料皮，字大，很少见。每一本书的最后一页都盖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四军党委赠”的印章，那时这些叫“精神食粮”，在当时很时兴。

空四军又顾虑大会不下发——当时连发不发都考虑到了，说明当时空四军、王维国和上海市委的斗争多激烈；上海帮真有可能只收不发，怕空军扩大影响嘛。后来想了一个好办法——很简单，在开会的时候敲锣打鼓送到会场，让代表们都看到，任何人都只能叫好，这样王秀珍他们就不能压下发不了。

后来根据“情况反映”，说王秀珍拿到《毛主席十篇哲学著作（大字本）》翻看时，开始说“很好！很好！”结果翻到最后一页，看到空四军党委的大红印章，很出乎她的意外，明显愣了一下。据说，本来她真是不想发下去的，但代表们都看到了，不得不发，于是人手一册，代表们皆大欢喜！

什么叫“情况反映”呢？由于当时空军的代表并不是集中坐，而是分散在地方代表中间，同各自军管的单位一起，所以就能把地方代表们的反映带回来了。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聚集在巨鹿路招待所，把当天会议的情况统一集中、汇总一下，由专人记录。然后一起研究下一步怎么对付上海帮他们，再汇报给王维国。这就是“情况反映”。

他们给王维国汇报时说，王秀珍在大会总结时说到“感谢警备区给大会送来猪肉”时，下面有掌声；说到“感谢海军给大会送来鱼和海蜇头”时，下面也有掌声；当王秀珍说到“感谢空四军党委给大会送来毛主席十篇哲学著作”时，下面的掌声就像暴风雨一般！“情况反映”讲：一开始是讲话，后来是演出，最后是献礼，党代会上空军这三招棋对弈的很漂亮，赢的非常好。

那时大会还安排代表们参观上海延安东路刚建好的第一条过江隧道，市里没车，由陆海空三军派车。据说很多代表都想上空军的车，彼此还讲“空军的车是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虽是戏言，但这就是当时空四军在上海的影响：群众威望很高，社会影响很好；上海帮想压也压不住。

会上陆海空三军代表自然都当选了市委委员，在准备投票选举书记和常委之前张春桥发言了，他按照江青的意思在会上讲了一遍那三条理由——“反正王（维国）政委嘛，已经是中央

候补委员嘛”，“今后都是集体领导嘛，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今后开会，王政委也是革委会副主任，也是要一道参加的”，“空四军是野战军，可能会调动，警备区是地方部队，是警卫上海的”等等。张把调子全都定好了，然后开始选举。这样一来，当然王维国就没有被选上书记。中共上海市第四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上海市委书记排位是：第一书记张春桥，第二书记姚文元，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关于如何甄选书记，本来王维国是上海唯一的一位中央候补委员，理应当选书记，根本不用争。但由于事先江青和张春桥做了充足的铺垫，最后上海帮如愿以偿了。

由于王维国带领空四军从1967年开始三支两军，参与了上海市的很多政务，对张春桥、王洪文的错误做法和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尽力去维护和保障一方平安，上海市人民有目共睹，空军在许多上海人的心目中的威望是很高的，王维国更是这种威望的代表性人物，上海帮则把王维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在党代会上的做法，明显是在拉拢其他军兵种，打压空军，排斥王维国，分化部队。在对党代会总结的会上，对于空四军在会上的表现，王维国认为是一个成功的会，一个胜利的会，同时也是把双方斗争挑明了的会。

今天回放这段历史，王维国没当选书记当然不能算是胜利，但空军的几次亮相是漂亮的，不仅顶住了上海帮施加的压力，而且从社会影响看，军队的正面形象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对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了军民关系，人民更加信任和拥护解放军。当时空四军是以打仗的心态去对付上海帮的，可见当时双方斗的多么激烈。总之党代会这一“仗”空军输的光彩。

当时也不光是空四军和上海帮的关系紧张。朱锡琪就因为对张春桥在军民关系上要两面派的做法和反感，这是他决定站出来“炮打”张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他的回忆中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说明意义的事情——张春桥、姚文元常常在兴国宾馆召集市革委会的核心成员开会，用张春桥的话就是“开小会”，参加者除了张、姚外，有王少庸、马天水（被“解放”后）、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和他，共八个人。这样的“小会”一般一两个月开一次，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小会”上先讲。1967年武汉的“七二〇事件”也影响到了上海，二医大的“红纵”也是上海市革委会成立时的发起单位之一，是张春桥支持的造反派。“红纵”和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矛盾也引发了已经担任警备区第一政委的张春桥与廖的不和，无论廖做什么事情都被张春桥阴阳怪气地驳回去，不同意。1968年春节前，上海市在市革委会礼堂召开拥军爱民大会，会后参加“开小会”的人又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到兴国宾馆吃饭，酒过三巡之后，张讲：昨天我们在市革委会礼堂开过拥军爱民大会了，这个会我们已经开过了，人家是不是拥护我们啊？张这么一说，大家马上明白他的意思了。

王洪文立即响应，说：廖政国是陈丕显的铁杆老保！又说：部队到公安局支左，公安局里也全部支持老保。

张春桥接着说：“我们头脑要清醒点，我们手拉手拥军爱民，最担心的就是军队不站在我们一边。你们不要学王、关、戚，他们在报纸上公开‘揪军内一小撮’，犯了错误。部队里的事情要端出来，只能由上自下，廖政国的问题总归会解决的，要相信党。”（见“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

朱不过是革委会政宣组组长，却是“开小会”的成员之一，王维国是上海市公检法主任，职务比朱高的多，重要的多，却不在“开小会”名单之列。上海市的“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小会’上先讲”，而参加“小会”的人里除了张春桥，没有别的军人。这说明张春桥非常“独”，为人处世非常的两“派”：一是要两面派，一是拉帮结派，什么团结，什么党性，什么原则，什么工作……统统被张春桥玩于股掌——刚刚在大会上与廖政国手拉手拥军爱民，暗地里却想着

怎样把廖揪出来。张春桥的话说的何等阴柔圆滑，两面派的手段何等高超，难怪朱锡琪看不下去，揭竿而起了。

黑格尔说：“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开小会”的形式揭示了张春桥的野心。显而易见，他是仿照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的关系与形式，“小会”就是上海的“小政治局”，张春桥是上海的“主席”。在这个“小会”上，张春桥完全撇开了与自己不和的军队，露出了真面目，更加随心所欲，呼风唤雨，称王称霸，将自己凌驾于上海市党委和革委会之上。

王维国在《遗稿》里总结到：“我们和以张春桥、王洪文为代表的‘上海帮’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是反对他们搞一统天下的斗争，是反对‘上海帮’为所欲为的霸权主义、以及他们推行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斗争，实质上是反对‘上海帮’那些野心家的斗争。”这个总结是客观的。

福兮祸所依。党代会之后即将召开工作汇报会，王维国看上海帮的架势，预感到自己要挨整了。上海帮本来就与军队面和心不合，通过党代会，王维国在上海的威望反而得到了提高，空四军的名气甚至超过了其他军兵种，这些都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他们也是不肯罢休的。

王大章讲：当时听父亲说市委委员杨富珍和陈敢峰，看他跟张春桥、王洪文他们对着干，背后没人撑着，蛮同情他的。杨富珍是位淳朴的劳模，能走上领导岗位是“三结合”的产物，保持了工人本色。陈敢峰是同济大学的造反派，年轻、单纯，没什么政治成见，当然也没什么势力，办事还要看张春桥、王洪文的眼色。这两个人在革委会里头人微言轻，谈不上有什么政治能量，他们的同情只能给王维国内心带来一丝慰藉。在王维国担任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和革委会副主任几年后，基本上被上海帮孤立了。换句话说，上海已经成了上海帮的一统天下。

（未完待续）
~~~~~

【史实订正】

向张玉凤、汪东兴当面求证“常委名单”

• 杨银禄 •

2010年8月20日下午6时，山西省政协委员白志平请张玉凤同志吃饭，我应邀也参加了。6时半，有的客人还没到，我利用这个等人的机会，和张玉凤同志单独谈了一件事。

我对张玉凤说：

玉凤同志，阎长贵和我看到从网上下载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张玉凤：毛泽东的临终遗命》，其中讲到，张玉凤提供：“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对于这则材料，阎长贵和我都不大相信，认为毛主席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应该核实，予以澄清。于是，我就打电话问了汪东兴同志的女儿汪延群（汪东兴当时身体欠佳），请她找个机会问问她爸爸。汪延群当即说：“我看过你说的这份材料，并问了我爸，我爸肯定地说：‘没有此事，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其目的是诋毁毛主席。’”

阎长贵同志为此事还特意打了长途电话给毛远新，毛远新说：“胡说八道，谁要说有这件事，

请他拿出文字根据来！”

我们经过核实，确认没有那些事情以后，写了一篇证伪的文章，《一则历史传闻的真伪》，刊登在《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上。

有读者在《同舟共进》2010年第8期发表《关于一则“传闻”的辨伪》文章，认为：“凡略有审干经验的人，包括汪东兴、毛远新在内，都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汪、毛二人的表态不构成充分的证伪的依据。除了汪东兴、毛远新二人的说法如上述外，要辨别真伪就不得不找张玉凤本人了。”

我说：“玉凤同志，今天就请你当着我的面亲口对我说，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张玉凤非常耐心地听完我的话，平心静气地对我说：“银禄同志，你们都是当过秘书的，有一定的政治鉴别力，不相信有那件事是对的，以积极的态度进行核实并发表文章澄清也是对的，我向你们二位表示感谢！咱们可以冷静地想一想，怎么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那个时候主席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说话不清楚了，有时我也听不明白，相互交流经常用文字，但是，他的头脑一直都很清醒，他怎么会产生那样的想法？他怎么会叫他的两位亲属、两位身边的工作人员当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是真的话，就不符合主席一贯的风格和政治原则。今天，我正式委托你们二位，对那件事进行再一次澄清，不要再以讹传讹了。网上流传我‘提供’什么云云的文章，我根本不知道。”

我俩这次谈话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谈话结束时，她斩钉截铁地对我说：“银禄同志，我负责任地说，绝对没有那回事。”

2012年1月18日春节之前，我和阎长贵同志一起去看望汪东兴老（已97岁了），顺便问了他几个问题，包括名单一事。汪老听了以后，断然说：“没有那么一回事，不可能有那样的事。”

网文所说三位“作记录”的人，均健在，他们都亲自对我们说：“没有那么一回事。”毛远新曾说：“对这件事情表明态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复。”（《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

我本着尊重对我们文章有疑问的读者求实存真的态度，再次对这件事情做些说明。

（作者系文史学者、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

□ 《同舟共进》2012年第5期

~~~~~

【春秋史笔】

倡优蓄之而不自知——读《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 余 杰 •

从延安时期开始，陈伯达就一直担任毛泽东的首席秘书，毛的很多文章都是由他执笔，他被公认为中共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陈是《毛泽东选集》的倡议者和编辑者，是《宪法草案》的起草者之一，也是“人民公社”这一名词的发明者。毛泽东承认：“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

有建议之权。”中共建政以后，陈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文革”伊始，升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政治局常委，成为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之下的第四号人物。然而，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在一九七零年的庐山会议上，陈突然被毛点名批判，定为反党份子，抓捕入狱。“文革”结束后，又以林彪集团党羽的罪名受到公审，获刑十八年，刑满后在半软禁的状态下孤独地生活，直至去世。

陈伯达晚年与儿子陈晓农朝夕相处，由陈晓农记录其谈话，留下《最后口述回忆》。陈既是党内斗争的牺牲品，又配合毛泽东害人无数，但他晚年的自我反思相当有限，整本书中只有寥寥数语：“我当时的讲话，以及以后的许多讲话，错误之处很多。主要是基本方向错了，把党内的问题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得罪了很多同志。我说过，这些同志要怎么处罚我都可以。”其实，共产党的残暴，早在其尚未夺取全国政权的延安时期便已暴露无遗，陈家亦深受其害，陈伯达对儿子说“延安整风时期，发生了‘抢救运动’，错误地整了许多人，包括你母亲，都受了冤枉。你母亲被关起来隔离审查，后来虽经复查平反，但她精神上受了很大刺激，从此精神逐渐失常。”然而，陈伯达仍然紧跟毛泽东，助纣为虐，后来下场之惨，亦可谓咎由自取。

◇ 奴才永远无法洞悉主人的心思

自从四十年代初担任毛的秘书之后，陈与毛如影随形，对毛忠心耿耿。虽然被毛整肃，陈直到晚年对毛的崇拜仍未破灭，至少在跟儿子的谈话中极少表达对毛的不满。谈及毛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对邓小平上台后对毛的部分否定，也不能认同。陈始终认为：“党的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党领导人民夺取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革命政党，总要有个指导思想。”他对毛可谓五体投地：“从感情上，从纪律上，我不可能不站在毛主席一边。”

陈在毛身边工作多年，未尝不想当魏征那样敢言的谏臣，但他生性软弱，几乎不敢在毛面前坚持个人观点。毛批评陈胆小怕事，不敢得罪人，岂不知，像陈这样一个只会摇笔杆子的人，要在危机四伏的中南海混下去，惟有八面玲珑、唯唯诺诺。

五十年代初期，毛与陈在玉泉山漫谈时，毛问陈：“我是在前台直接主持国事好呢？还是退到后面坐而论道好呢？”陈心里觉得，毛还是超脱一些，坐而论道好，但陈没有说出来。“因为按照毛的性格，有时候意见提得直了，反而起反作用。”

毛称赞的皇帝是刘邦和朱元璋，而陈认为好的皇帝是唐太宗和康熙。毛完全是个刘邦、朱元璋式的流氓地痞，陈则多少有点士大夫文化传统的熏陶。六十年代初，陈向学术界提出，可以多写一些唐太宗和康熙，也是想影响一下毛，却收效甚微。

有一次，陈和毛谈话，向毛推荐方孝孺的《深虑论》，陈十分欣赏方的名言：“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他希望毛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不要过虑。陈对毛说：“方孝孺的《深虑论》很值得一读。”毛却说：“他自己的结局怎么样？他都虑不到自己的命运，还谈什么深虑。”话就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多年后，陈回忆说：“方孝孺因为不肯为明成祖起草诏书，被夷十族，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问题是，我不是在谈方孝孺个人的命运如何，而是在谈他文章中的道理，可毛故意岔开了话题，他明白我想说什么，不愿让我继续再谈下去。”毛比明成祖更为残暴，哪里会认同敢于顶撞暴君的迂夫子方孝孺呢？

毛家与陈家还发生过一桩非同寻常的事情。陈的长子陈小达在苏联生活多年，与毛的女儿李敏谈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恋爱。后来，李敏突然提出分手，陈小达精神崩溃，自杀身亡。陈闻讯，悲痛欲绝，却强忍悲痛，继续为毛服务。共产党的体制就是要泯灭最基本的人性。毛本身

即为一个六亲不认的冷血动物，当然希望其下属也如此。在这一点上，毛比古代的皇帝更为专横霸道。陈小达、李敏这对年轻人恋爱关系的终止，是否由于毛的干涉，尚无确切证据。但陈晓农分析说：“毛本人待人处事总是首先从政治的角度着眼，他对政治的重视程度是压倒一切的，他不会同意一个几乎已经俄国化的青年来做他未来的女婿，这也是情理中的事。”这一分析很有道理。

陈自以为很了解毛。其实，即便是陈这样多年来与毛朝夕相处之人，也并不了解毛真正的心思意念。毛从来没有尊重过陈，只是将他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道具，一旦失去利用价值，立即弃之如敝屣。陈在庐山会议上支持设置国家主席，以为这是出于毛的意思。谁知毛突然变脸，陈一夜之间便成为众矢之的。毛在大会上肆无忌惮地痛骂陈，陈的脸色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了猪肝色。中共的党内斗争，宛如互相撕咬吞噬的鳄鱼潭，其粗暴野蛮程度，在共产党国家中亦无与伦比。

陈最后一次见毛，两人见面握手以后，毛责备陈许久不找他谈话，说：“这几年你官做大了，不来见我了，也不写文章了。”其实，陈一直想见毛，却总见不到。每次求见，毛的秘书徐业夫总说毛有事。陈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毛批评陈参加“军事俱乐部”，对陈宛如晴天霹雳。陈说，愿意做自我检讨。毛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陈感激毛宽大的盛意。告别时，毛同陈亲切地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毛对陈，玩的是猫捉老鼠的游戏，陈却信以为真。从此，陈直至下狱，再也没有见过毛。毛之无情无义，举世无双。

◇ 地位最卑微的政治局常委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刘少奇已被打倒，毛重新调整领导班子。毛和周拟的常委名单把陈排在周后面。陈找到毛，说：“我能力不行，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得那样靠前。”毛拿起笔来，把排在名单后面的陶铸的名字钩到陈的名字前面，对陈说：“你看这样行了吧。”不久，陶铸垮台，陈又名列第四。

毛用陈，无非是觉得陈对他造不成实质性的威胁。林、周一文一武，毛不得不用，否则“文革”搞不起来，刘邓集团也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之后，毛又害怕林、周尾大不掉，对他们处处防范，并没有将他们当作“亲密战友”来看待。实际上，毛要扳倒林、周，需要使用比扳倒刘少奇的“一根手指”更大的力量。多年来，毛不断敲打周，检验其忠顺程度，却一直没有对周下最后的狠手，因为废掉周之后，很难找到对行政系统如臂使指的继任者。而当林不肯屈服，毛遂使得林家破人亡且背负叛国之恶名，但“九一三”事件也让毛本人的声望降至历史最低点。与林、周两人相比，陈是孤家寡人，毛一根手指都不动，就可以轻松将其除掉。所以，毛放心让陈滥竽充数。当时，周恩来亦认为，陈入常委，只是权宜之计，陈的位置很快就会让给别人。到了九大选常委时，周就坦率地对陈说：“没有想到你仍旧列入了名单。”不过，陈的出局已指日可待。而且，共产党高层根本没有“全身而退”的机制，刘少奇、陈伯达都曾幻想，即便失宠，也可无官一身轻、回家务农去。然而，等待陈的是千夫所指的下场。

“文革”初期，陈的官越来越大，精神却越来越痛苦，用“高处不胜寒”来形容实在太轻，几乎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在苦不堪言的处境之下，他甚至动过自杀的念头。知父莫若子，陈晓农评论说：“陈伯达本来是个性格懦弱的人文人，‘文革’以来他被夹在各种政治力量激烈冲突的夹缝中，随时会被挤碎。他既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也要承受毛泽东的不满和责难，还要承受对毛泽东的方针、政策持不同或对立意见的人的攻击和讥讽，更要承受毛泽东夫人江青的逼迫以至假传圣旨的捉弄。”比起外人看来掌握权力的风光来，内里是动辄得咎、手脚无措的恐惧与忧虑。陈多年担任毛的秘书的职务，在党政军各方面并没有形成个人的派系，实力根

本无法与林、周相提并论。陈这个常委就是个空架子，即便级别比他低得多的人，比如新冒起来的笔杆子姚文元，都不把陈放在眼中。既然政治局常委的尊贵身份不能让刘少奇幸免于难，又岂能让陈伯达有功成身退的机会？

陈在晚年谈及几个细节，生动地说明了他在党内是如何地窝囊：当科学院成立革委会时，周恩来让陈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去参加成立会。江青不去，还组织小组其他成员不去。陈叫戚本禹、关锋去，他们就是不动。陈只好一个人去了。由此，陈感叹说：“这件事表明，他们听江青的，不听我的。”有一次，江青来到陈的办公室，到书架跟前查看，看到书架上有一本精装的《宋庆龄文集》，就拿下来摔到地上，用脚踩。可见，江青在其面前飞扬跋扈到何种程度。还有一次，陈到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在会客厅刚坐下，忽然，江青、康生来了，立即说要召开会议。姚文元就在楼上，一叫就到。于是，江青宣布开会，他们三个轮流责骂陈对中央文革的工作不积极。小组成员如此对待组长，亦是亘古未有之奇观。

由于陈不堪江青及其身边人物之凌辱，当他发现林彪集团有反江青的倾向时，逐渐向林彪靠拢，希望借此巩固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在林彪接班之后仍然能在中央有一席之地。在中共黑箱操作的权力系统内，这是人之常情。然而，陈丝毫未觉察到毛林之间出现很大的裂痕，此时他偏向林彪，正好犯毛之大忌。另一方面，陈分管华北，竭力拉拢华北的党政军要员，他幻想，即便无法形成个人的团队，至少也要有一群关系亲密的盟友。这又是毛不能容忍之举动。于是，陈的倒台便成为定局。

在毛泽东时代，毛要搞掉其他任何一名政治局常委，只需要打出路线斗争的翻天印就能百战百胜，并不需要经过党内的合法程序，党章亦形同虚设。毛自诩为“泼猴”，不受任何制度的束缚。对陈的处理也是如此，将陈关入监狱时，本来要送入条件极差的囚室，陈狂呼他在国共内战中救过毛的命，这一细节被汇报上去之后，毛又下令改善陈的待遇。可见，毛个人的喜恶完全凌驾于法治之上。

◇ 中共党史上的“文人祸水论”

陈是“五四”遗风影响下的知识分子。在厦门求学期间，与陈嘉庚的儿子同学，后来在上海和广州求学，曾受教于“五四”那一代的名作家朱湘和郁达夫。他由参与北伐到投身中共革命，早年确实深怀理想主义。

以知识分子走上仕途而论，陈堪称清朝灭亡以后中国地位最高的知识分子。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中，有许多身居高位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大都在专业部门任职，如外交、教育、法律、财经等部会，位居中枢者不多。胡适一度被蒋介石看重，希望其出任虚位总统，但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复杂，未能实现。胡适在国民政府内地位虽尊，却始终是处于权力边缘的“诤友”。而陈伯达以秘书之职务，以理论家之身份，进入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行列，在中共内部亦是前所未有的。但是，陈伯达的失败，正表明知识分子参政在专制制度下的巨大危险。知识分子多少要忠于某种理念和价值，而政客的成功正是善于玩弄理念和价值。陈与毛之差异正在于此，陈有几分知识分子的底色，无论如何拼命地向毛学习，亦学不到毛深入骨髓的厚黑学之皮毛。

毛不是知识分子，毛极端仇视知识分子。中共建政之后，知识分子被划入劣等公民行列，即“臭老九”。毛对当年北大那些瞧不起他的大知识分子痛下杀手，即便是对于“南书房行走”的陈，也深怀嫉妒。陈谈及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毛访问苏联期间，一次中苏高级谈判，双方一度陷入僵局。斯大林引用陈伯达的文章开玩笑，以调节气氛。斯大林对陈的文章中丑化国民党与美国关系的细节印象深刻，陈造谣说宋美龄将手放在罗斯福腿上，与之眉目调情。陈伯达之文风恶劣，斯大林之品位庸俗，由此可见一斑。这还不是这个故事的关键之处。精彩的还

在后面：斯大林谈到高兴处，拿着酒杯站起来，到陈跟前，向其祝酒，微笑着说：“祝中国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陈伯达同志身体健康！”当时，陈立即感觉毛对这一突然出现的场面很不高兴。因为斯大林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不是向毛敬酒，而是向毛的下属敬酒，而且陈和斯大林互相敬酒时又是用俄语致辞，毛无法立刻听懂他们在说什么，当场脸色就变了。于是，第二天的会议，毛不让陈参加。毛的心胸狭窄到了如此地步。

“文革”初期，周恩来让陈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不肯当，建议让康生当。周说，康生不合适，在中央里面就数陈文化高。陈推辞几次，周说：“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陈只好同意。毛回北京，陈又向毛提出：“我是书生，当不了组长。”毛说，你可以把“书生”两个字去掉。但对陈来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即便陈拿掉“书生”这两个字，别人仍然将他看作是无太大用处的“老夫子”，“老夫子”本身就是一个贬义词——在中共的价值系统里，“枪杆子”的作用远在“笔杆子”之上。对此，陈晓农指出：“在中共领导层内部，文人不被当回事，高兴时是工具，不高兴就成了出气筒，国家出了点问题，就往文人身上找原因，将文人批判一番，皆大欢喜。”这固然有陈晓农为父亲开脱的一面，却也部分道出中共权力运作的一条规律。中共建党之初，尚有不少一流的知识分子厕身其中，毛泽东掌权之后，中共遂彻底堕落为反智主义的流氓集团。有文化、有良心的人在党内一直受嘲讽和排挤。像陈伯达这样已经很坏，却还坏得不彻底的人，亦不得善终。“文革”中当过四人帮写作班子成员的北大历史学家周一良以“毕竟是书生”作为其回忆录的书名，暗有为自己辩解之意。这句话，陈伯达也可以借用过来撇清自己。但是，无论是否为“书生”，干了坏事就得承担责任，尽管书生所起的作用，跟流氓头子比起来，只能算是胁从而已。

陈在晚年多次感叹说，在国民党时代，中共前总书记陈独秀被审判时，与之政见不同的老友章士钊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后来胡适等人还去狱中看望。国民党并没有对陈的支持者搞株连。而陈伯达垮台后，几乎没有人与之来往。庐山会议之后回北京的专机上，同机的高级官员个个对他冷若冰霜。“现在革命胜利了，一个人一旦有事，大家就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然而，陈却没有对此作更为深入的反思：这种风气是如此形成的？这就是威权统治与极权统治的差别：前者容许存在一定的公共空间和个人情感，故而传统的伦理道德不致被全部摧毁；后者则由党垄断一切，全民以党及其领袖之是非为是非，连血缘亲情都被破坏殆尽。陈伯达正是这一历程的积极推动者，当“请君入瓮”的时刻来临，他就只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 原载《纵览中国》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
